

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和出路

赵华胜

【内容提要】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战争频发的时期。拿破仑战争后在国际安全领域曾形成过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它们都试图以不同形式保障和平、防止战争。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将退出人类政治生活的预测不断出现，而现实却截然相反，特别是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带来持久和平，反而开始了一个酝酿和积累新冲突的过程，俄乌冲突是其集中体现。形势仍在滑向令人不安的方向，传统的影响国际安全和刺激战争发生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时又增加了新的诱发战争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安全治理与安全体系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可见的将来，形成具有相对整体性的国际安全体系困难重重，但国际社会不能放任自流、退回到“丛林时代”，而应努力寻找实现长期和平的途径。为此，既需要接受新的安全理念，同时应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有益和有效的做法。文章以战争与和平问题为主题，分为五部分内容：首先，从宏观角度回顾近代以来不同时期国际安全体系的变化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其次，综述在战争问题上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观点及其依据；然后指出，认为战争已经过时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并分析产生这种判断的原因所在；紧接着指出使当今世界更不安全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实现国际安全的基本思路 and 可能路径。

【关键词】 安全治理 安全困境 国际体系 国际安全机制 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一个半世纪前，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将他以反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传世之作取名为《战争与和平》，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在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时，战争与和平又自然地浮现出来，并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定性发起挑战。当今世界正在经受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范围和最大规模的战争，战火同时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燃烧，而且整个世界都处于可能发生大战的边缘，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发展至更坏的情况，这是在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情形。

寻找通向和平之路是当前最严峻的挑战。熄灭已燃起的战火，防止发生新的和更大的战争，不论对世界和平还是对处于战火中的国家来说，都是当务之急。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国际社会还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能否在战后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际安全体系，以求最大限度地使战争减少甚至不再发生，最大限度地使世界和平得到长久保持。

一 国际安全体系机制的建立与失效

1795 年，欧洲正陷入纷乱和战火之中，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发表了《永久和平论》。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永久和平”的命题^①。这一命题提出了人类彻底摆脱战争的崇高理想，同时也提出了人类社会达到这一目标的假设路径。在此后至今的两个多世纪里，国际社会进行了多次尝试，特别是在每次大战之后，痛定思痛，都试图找到一种整体性的机制，或者说建立一种全覆盖的安全秩序，以预防战争再次发生，实现持久的和平。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形成了维也纳体系。它以均势为核心，欧洲大国间保持力量平衡，不使任何大国拥有绝对优势，防止出现霸权国，如果有一国试图凌驾于他国之上，其他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使它不敢发动战争。这一安全体系也被称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注重以协调作为调解大国矛盾的主要手段，在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时召开会议，通过协商化解危机。大国协调机制虽没有完全杜绝战争的发生，但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上说，相较于 18 世纪，19 世纪欧洲重大战争明显减少。大国协调机制在 1853 ~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后走向式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完全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凡尔赛体系。它以对战败国德国实施极其严厉的军

^① [德] 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备限制和巨额赔款为特点，试图防止德国在经济上翻身和军事上大规模重整，使其不能东山再起，不能恢复发动战争的能力，保证战争不再发生。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德国进行惩罚和报复的心理，法国的这种意图尤其明显，它与德国是“世仇”，对德国有特别的认识，认为普鲁士“是从炮弹里孵出来的”^①，天性好战，因此开出的条件尤其苛刻，意欲将德国永远打翻在地。对德国的经济惩罚超过了德国可以承受的能力，导致德国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天文数字般扶摇直上，民众生计无着，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激进势力顺势崛起。最终，凡尔赛体系不仅未能阻止德国重新武装，反而刺激了德国强烈的复仇心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已经预言，凡尔赛协议不是通向和平，而是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伏笔^②。不过，也有人得出这一结论是出于相反的理由，认为对德国的条件过于宽松，使德国保留了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③。如基辛格所说，凡尔赛和约之严苛使得和解成为不可能，但又没有严苛到使德国不能恢复生机的程度^④，最终结果是它不但没有成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反而成了“终结和平的和平”^⑤。

凡尔赛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乏有效的执行保证，特别是在军备领域。凡尔赛体系没有规定进行军事干预的条款，因此多国集体安全框架只能是空想^⑥。另外，凡尔赛条约的制定者也没有进行军事干预的意志。鉴于一战的惨痛经历，战后欧洲和平主义盛行，英法实行绥靖政策，心怀侥幸心理，期望以让步和牺牲他国利益来避免与德国的战争。因此，当德国不断地突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和重

① 据信拿破仑和克列蒙梭都说过这句话，参见〔美〕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9页。

②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指出，德国负担不起这笔强加的赔款，如果蓄意让中欧陷于贫困之地，爆发最后冲突的时刻必然不会太远，而新的战争将摧毁文明，无论谁是胜利者。参见〔美〕托德·布赫霍尔茨、〔美〕马丁·菲尔德斯坦：《经济巨擘：思想碰撞与传承》，风君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版，第263页。

③ 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法军总参谋长的费迪南·福煦元帅持这种看法，并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20年。”参见〔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姜玲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428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丽萍、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97~98页。

⑤ 〔美〕安东尼·帕戈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方宇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第399页。

⑥ 〔英〕伊恩·克肖：《地狱之行（1914~1949）》，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124页。

整军备时，甚至在公开违反条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时，英法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持隔岸观火心态，只是到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本土后才不得不全力抵抗。

国际联盟也是凡尔赛体系的组成部分，它在拥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和坚持下成立，先后有 63 个国家加入。这是以建立世界政府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式，也是一种全球治理的雏形。国联创立的初衷是成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但它的创始国美国却因国内反对而未能加入，因而英国和法国成了它的主导。国联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但它既缺乏意志，也没有能力，主要服务于英法的利益，面对德意日的侵略行为无能为力，未起到解决地区冲突和防止战争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凡尔赛体系已经名存实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踵而来的是雅尔塔体系，它主导了战后的国际秩序。雅尔塔体系由一系列不同的部分构成。它的一个核心支柱是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法原则。可以说联合国是国联的升级版，但比国联有了质的提高。这是有史以来最有世界代表性也是最接近世界政府的国际机构，最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国际承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一定的决策权。它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它有自己的宪法——联合国宪章；它有自己的经费预算——成员国的会费；它有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决议的决策机构——安理会，其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它每年召开联合国大会，所有成员国都可参加；它还有自己的常设职能机构，在世界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尽管联合国有种种不足，但它对维护世界和平和解决地区冲突的重大作用无可代替。

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美苏两极格局，这是雅尔塔体系的又一个核心支柱。以苏美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军事组织、经济市场、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一个宏观的地缘政治框架，支撑着冷战时期的国际结构。两大集团相互对立，但力量大致平衡，相互都有强有力的制约手段，这使双方都不敢铤而走险。因此，虽有时剑拔弩张，也发生过几次严重危机，但结果都有惊无险，没有发生系统性的对撞，整个框架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核武器的出现是二战后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观念，对国际安全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核武器以其超出想象的巨大杀伤力，使人类自身的存在处于危险之中。核战争对人类有了不同于传统战争的意义，它关系到世界的毁灭和自身的生死。核武器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危险，但因其造成的后果难以承受，也产生了抑制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功能。核大国之间使用核武器必将招

致对方的核反击，结果将是同归于尽。冷战期间苏美进行核竞赛，积累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地球多次，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毁灭对方之前而不为对方毁灭，因此核战争是难以想象的，“核战争打不赢，不能打”的戈尔巴乔夫—里根模式成为默认的规则^①。核战争一定始于常规战争，为了避免核战争，核大国之间首先不能发生战争。同时，因为核战争是对全人类生存的威胁，它也变为一个重大的道德问题，核武器成为国际公认的禁忌，是不能越过的政治和道德门槛，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都会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反对。

二战之后，还出现了一个对欧洲安全影响深远的重要因素，即欧洲政治、经济、安全的一体化。这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自罗马帝国之后，欧洲从未统一过，拿破仑和希特勒曾有过控制全欧洲的野心，但都以惨败告终。更重要的是，二战之后欧洲的一体化与历史上的统一欧洲都不相同，它是由多国和平结合达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强国对他国的武力征服，它的目标是建立集体安全，而不是帝国治下的和平。欧洲的一体化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发展到欧共体，再升级到欧洲联盟，邦联形式的欧洲合众国隐约成型。它虽然还不能与真正的国家政府相比，但已经具备了某些政府功能，它代表着全欧洲，有着相同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全欧洲实施管理，联盟有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有统一的关税边界，统一的货币，执行联盟的财政标准，实施协调的对外政策。在安全上，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包括欧洲国家，而且与美国结成了长期的军事联盟。

统一欧洲的形成对欧洲安全的意义在于：除了对外功能，它消除了欧洲内部的战争根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欧洲历史充满了战争。在这片并不很大的土地上，小国林立，钩心斗角，王权、家族、邦国、列强之间的争斗无休无止，几千年里战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统一欧洲的形成改变了这种状况，欧洲国家的相互关系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彼此独立的个体成为集体中的一员。每个成员都受到集体的制约，违背集体意志一意孤行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特别要指出的是，二战的战败国也被纳入欧洲集体之中，特别是德国，这是接受了凡尔赛体系的教训，不再以从外部的摧毁式压制来防止德国重新发动战争，而代之以将其纳入集体之内，推进其内部改造，与之形成利益交织，同时也将它置于密切的监

^① “Joint Soviet – United States Statement on the Summit Meeting in Geneva, November 21, 1985”.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joint-soviet-united-states-statement-summit-meeting-geneva>, 访问时间：2025年2月1日。

督之下，使其不能脱离规定的轨道。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曾说，北约的使命就是“赶走苏联人，留住美国人，按住德国人”^①。欧洲的这一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冷战近半个世纪中，统一欧洲内部没有发生战争和军事冲突，这在欧洲的全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它也间接地对国际安全产生了重要的正面作用。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欧洲内部战争外溢而成，事实上，在当时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只有欧洲是“全球性”的，也只有欧洲的战争能把全世界拖入进去，因此，欧洲内部战争根源的消失，也意味着世界大战主要根源的消失。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集团的对抗结束，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两极结构崩塌，支撑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二断其一。这导致国际力量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力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没有了任何制衡力量，美国的傲骄之心随之膨胀。它把冷战的结局看作是一场战争的结束，美国是战胜国，俄罗斯是战败国，赢者通吃。美国的帝国思维迅速发酵，试图重新安排世界，将其制度和价值观推向各国，不惜以政治干预和武力形式，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统天下。

在这个背景下，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应运而生。美国开始以符合其需要的新标准取代原规则，与之相适应，大量新概念应运而生，为美国建立新规则和新秩序提供理论支持，诸如历史终结论、帝国稳定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民主和平论，等等。同时，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在某些方面使美国感到不便，甚至成了它采取行动的障碍。美国对联合国的藐视越来越明显和公开，越来越频繁地绕过联合国，选择性使用联合国所主张的原则，国际法原则屡屡被打破，联合国的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大降低，终致支撑雅尔塔体系的另一支柱摇摇欲坠。

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雅尔塔体系的瘫痪，使得后冷战时期最初的玫瑰色理想迅速失色，进入了“冷和平”。虽然没有了两大阵营对立，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状况甚至比冷战时期更严峻。原有的安全机制被破坏，新的机制没有建立，欧安组织已经名存实亡，赫尔辛基文件被完全遗忘，国际政治不可抑制地滑向无规则、无权威的状态。而最不寻常的是在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后，战火在欧亚大陆不断重燃，先后发生了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纳卡冲突、俄格战

^① 它的原文是：“Keep the Soviet Union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 参见 “It is Your Duty to Accept, Pug”，转引自 “Churchill to Ismay”，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declassified_137930.htm，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1 日。

争、俄乌冲突等。此外，美国还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军事干预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俄乌冲突对国际安全最具破坏性，其规模和残酷性都让人难以置信是发生在 21 世纪的欧洲。

这场战争的特别危险之处在于，它虽然被称为俄乌冲突，但它实际上不仅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而且已经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尽管它还以“代理人战争”作掩饰。北约军队没有直接参战，但它已深度介入。北约与乌克兰在同一条战线有着角色分工：乌克兰处于前线，北约为其后盾。作战的是乌克兰军队，但支持战争的资金来自北约。乌克兰军队由北约装备，使用的是北约的武器。北约向乌克兰提供飞机、大炮、坦克、导弹、信息情报、后勤保障、部队培训，并派遣军事顾问甚至雇佣军。与此同时，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保持着战略性军事威慑，对俄罗斯进行信息战和混合战，并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最严厉经济制裁和全面封锁，以枯竭俄罗斯的生存资源，使俄罗斯无法继续进行战争。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行为，都已远远越过了参战的门槛，实际上，各方对此都很清楚，只是心照不宣，以便尽力维持着哪怕是表面上的北约与俄罗斯未直接军事对抗的表象。

由于俄乌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因此它也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五个核大国中的四个参与其中，这又带来了发生核冲突的风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核安全环境恶化，核战争风险随之上升^①。事实上，从俄乌冲突一开始，核因素就一直伴随着战争的过程，俄罗斯与美国进行着几乎是公开的核博弈，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人类正在玩弄一把上了膛的枪”^②，在自 1962 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之后的六十多年里，世界从未如此真实地感受到核战争的危险，也从未离核战争如此之近^③。

① 有研究报告总结了导致核危险上升的因素：（1）竞争、不可调和的叙事导致威胁感增强；（2）信任危机；（3）国内政治需要；（4）联盟政治；（5）近距离军事接触；（6）沟通渠道中断；（7）防止使用核武器的保障措施失灵；（8）常规力量悬殊；（9）肆无忌惮的核威胁；（10）缺乏核经验。Robert E. Berls, Jr., and Leon Ratz, “Rising Nuclear Dangers: Assessing the Risk of Nuclear Use in the Euro – Atlantic Region”, NTI Paper, October 2015, p. 1.

② 《古特雷斯：应对核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没有核武器》，<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08/1107422>，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3 日。

③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2024 年估计有 3 904 枚弹头部署在导弹和飞机上，比 2023 年多出 60 枚，其中约有 2 100 枚弹头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几乎所有这些弹头都属于俄罗斯和美国。SIPRI Yearbook 2024.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YB24%2007%20WNF.pdf>，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9 日。

二 理想主义的顽强和挫折

回顾历史，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随着世界进入现代时期，曾经出现过乐观主义的期望，认为战争将不会再发生的观点曾流行一时，预测战争将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将最终摆脱战争梦魇的曙光。但需要指出的是，它是从欧洲中心的视角，所指也是欧洲和大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指一切地区的一切战争。乐观思想产生的来源不完全一样，论证方式也有所差别。

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论据之一。这种观点认为，一场 20 世纪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将使胜者和败者同样遭殃，双方都会遭受重大损失，经济崩溃，财政破产，生灵涂炭。即使战胜国吞并了战败国领土，得到战败国赔款，战争的获益也将不再能弥补成本，因此战争无利可图。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同样含有遏制发动战争的因素，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因此战争绝无可能^①。

武器技术的发展是又一解释。随着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式武器的出现，杀伤力成数倍地提高，其毁灭性与传统武器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据此，有看法认为，现代战争几乎就是消耗战，不仅成本变得非常昂贵，而且空前残酷，甚至可能导致彻底毁灭。因此，国家将不会再选择战争，战争事实上不可能再发生^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远在核武器出现之前的 20 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了。

还有一种解释是基于社会进化论。这种看法相信，随着文明的进步，战争将注定消失，在历史上，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部落战争、王朝战争、神圣战争，未来可实现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③。可以说，这一看法与康德的思想接近，康德所主张的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多元体系，以此实现永久和平^④。

这一波乐观主义思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高潮，即使在战争爆发后，乐

① 〔美〕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第 12 页。

② 〔英〕詹姆斯·乔尔、〔英〕戈登·马特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第三版），薛洲堂译，商务印书馆 2022 年版，第 354 页。

③ 同上，第 358 页。

④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程卫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0 页。

观主义者还寄希望于这场战争将是人类最后的止战之战，“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成为历史名言，不脛而走^①。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理想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在国际政治中近乎销声匿迹。但经过此后长时期的和平岁月（指未爆发新的世界性战争），特别是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终极和平的思想又悄然萌生。著名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总结道，当今时代史无前例地打破了两个规则，一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为过去的主要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现在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能夺取矿产资源，却无法霸占知识，因此通过战争攫取财富已无可能，战争越来越被局限在维持着旧式物质经济的特定区域（比如中东和中非）。另一个被打破的是“契诃夫法则”，这一法则来自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在第一幕中出现的枪，在第三幕中必然会发射”。也就是说如果手上有了新武器，迟早会禁不住诱惑去使用。但现在这一法则已经不起作用，存在武器不意味着它们会被使用。核武器就是最突出例子，现在核大国的武器库中核弹头堆积如山，但自广岛长崎以来它们从未被使用过^②。

遗憾的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乐观主义的预言再次落空。这并不表明它的思想不正确，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这也不是说它的论据是不可靠或错误的，事实上，它的所有论据都是真实和有道理的；这也不是说它的推论没有条理，应该说它的论证合乎通常的逻辑，但是，看起来合乎情理的预测结果始终不能实现，那一定是存在着超越了其论证和逻辑的更强大的因素。

“成本—收益”是战争消失论最常用的论证途径，国家投入战争从根本上说都不能不遵从“成本—收益”的逻辑。问题是，在具体事例中，不同背景的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时空条件，对成本和收益的理解会不一样，有时甚至相反，因此，从同一个公式可能得出多种结果。而错误预测的原因在于它的使用者只看到了或说只想看到它的一种结果，而忽视了它的其他可能。

在“成本—收益”模式中，经济利益通常被作为最重要的参数，甚至是唯一的参数，它反映了经济决定论的思维，也是对“成本—收益”的狭义理解。

① 这句话常常被认为是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名言，但这可能是历史误植，它的真实出处可能是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著作《结束战争的战争》。H. G. Wells, *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 Prabhat Prakashan, 2020.

②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5~16页。

毫无疑问，经济利益具有基础性意义，但对于战争来说，它远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与经济利益并行的还有其他重大利益，安全、国际权力、荣誉、宗教、政权安全等都在其中，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会压倒经济利益，并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来获取。

即使是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虑的思维中，一定的经济损失不是不能接受，发起战争的目标是要给对方造成更大的损失，使其难以承受，也就是说这种逻辑更关注相对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预知本国将遭受重大经济利益损失，但也不一定能打消其进行战争的意图。而且，国家发动战争，都认为自己能够获胜，会获取战利品，弥补战争的损失，失败或两败俱伤只是在战争之后才知道的结果。国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并不是一切战争都会以同等损失结束，因此，以此作为必然结果来进行推论也是不完全可靠的。

虽然科技和知识已经是国家发展的主要象征，但它们未能消除传统的导致战争的根源，安全问题、民族矛盾、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等仍然在把国家推向战争，在近年发生的俄乌冲突、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印巴冲突中，都可以看到这三种因素的交织。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乐观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它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和文明的进步，但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它们在宏观层面上可以有一致的解释，但在微观层面却千差万别。人并不总是理性的。认为在有关战争这样重大的事务中，人总是受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支配是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了。情绪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事实上有些战争受到情绪的极大影响，甚至是情绪的产物，这种情绪不仅是指掌权者个人，也包括彼时的民族情绪和民众情绪，它们也会构成战争的起因，这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不能排除这一因素。

理性只是理性人的规则，不是所有人都遵循这一规则。在国际政治中，理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和笼统的，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性，它受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的理性，在另一些人看来是不理性；在一些人看来得不偿失，在另一些人看来值得付出，这虽是相对主义的解释，但也不无道理，“伊斯兰圣战”理念与世俗观念的对立就是最极端的例子。即使是在共同接受的理性叙事中，有人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战争，也有人会选择为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而避免战争，很难评断哪个选择理性，哪个选择不理性。而且，理性的人也会有错判误判，错判误判并不一定违背正常理性，它可能也是一种正常的理性行为，而只是对问题的认识发生偏差。因此说，作为战

争消失的论据，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抽象和笼统的理性并不完全可靠。

历史进步论也是战争消失的重要论据。毫无疑问，从宏观的角度，历史是进步的，与过去相比，人类在战争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仅仅是在一个多世纪前，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把战争看作是件好事的理论还堂而皇之地流行于欧洲，认为战争能荡涤灵魂，净化社会，推动世界发展。这类看法不是普通民众的街谈巷议，而是出自社会文化精英之口，并且也为一些政界和军界人士所崇尚。这在当今时代已难以想象，现在战争作为政治手段的合法性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否定，公开鼓吹战争已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容忍。尽管历史已大踏步地前进，但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还远未达到消除战争的程度。不仅如此，历史进步不是一直线性向前的，它也会发生逆转，文明可能出现退化，跌入历史倒退时期。当今的国际政治状态特别是目前仍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在所有关于战争消失的论证中，核威慑和核毁灭是唯一仍被证明有效的论据，不过，这一公式虽还未被打破，但已开始受到挑战。确实，核武器的出现对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核威慑的存在是最重要的抑制因素。但是，因核威慑而被防止的主要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一定是其他的战争，事实上它未能消除一切战争。因此，从这一论证中只能得出核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推断，而不能得出战争不会再发生的结论。

而且这一结论根据的是冷战时期的经验，可以用于解释冷战时期，但不一定能用来解释未来，形势的发展已经对它提出质疑。俄乌冲突事实上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力量。2025年4~5月，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武装冲突，双方使用了战机和导弹，它们也都是拥核国家。这两个案例打破了核大国不会发生战争的定论，据此，有观点认为流行了大半个世纪之久的核威慑理论已经失效^①。然而，这个结论也有失绝对和偏颇之处，俄乌冲突之所以未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战争，印巴冲突之所以没有发展为两国的大战，核威胁的存在仍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无论如何，核威慑可阻止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理论是过时了，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必然导致核大战的结论也在接受检验。

^① Jude Russo, "Nuclear Deterrence Is Over. The Russia - Ukraine and Indo - Pak Conflicts Have Undercut the Threat of the Bomb".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nuclear-deterrence-is-over/>,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日。

三 世界将更不安全

可以看到,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国际社会建立过多种安全机制,尝试过不同的安全模式,见证了诸多被认为可使战争消失的因素的出现,包括经济全球化、扩张手段的改变、战争成本的上升、核武器的出现、社会文明的进步,等等。它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减少战争发生的机会,改变战争的某种形态,形成一些更文明的战争规则,但它们都没有使人类彻底摆脱战争。简单说,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或者说自人类有史以来,战争与和平问题至今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由此,可能不得不同意这样一种古老的观点,即和平不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它既不是自然之物,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保持的,和平是创造出来的,并且需要精心维护。与之相反,战争的基因则天然地存在于人类生活中,如果没有制约,它随时可能诱发冲突。

与世界经历的前一个历史时期即冷战时期相比,现今的世界没有变得更稳定、更安全、更可预测,相反,它变得更动荡、更危险、更难以预知。世界正处于破坏而非建设的时期,原有的国际机制瘫痪、半瘫痪、失效,原有的规则被藐视和打破,约束力减低或丧失,共同接受的新机制和新规则尚未建立起来,世界在向着分裂和碎片化的方向滑行,包括在政治、外交、安全、经济、金融、产业链,技术体系乃至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领域,即使是在气候、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合作也越来越困难。

(一) 国家关系武器化

国家关系被“武器化”,它的一切要素都可能成为制裁的工具或对象。仅仅几年前,将经济关系政治化还是禁忌,而现在已是理所当然。国家关系的所有领域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包括人文领域。国家关系的意识形态化加深,价值观外交在西方国家重新占据上风,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关系,将其分为所谓民主和集权两大阵营。

大国关系进入了更不稳定的时期。大国关系仍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它不仅关系到双边,而且直接影响地区和国际安全。现今的大国关系可以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差的,而且在向着越来越差的方向发展。大国地缘政治对抗不断加剧,它们之间的针对性乃至敌对性不断加深,准确地说是美国和西方对中

国和俄罗斯的针对性和敌对性不断加深。它们视中国和俄罗斯为安全威胁，采取以中俄为针对对象的外交和军事部署，并极力推动阵营化，把中俄和其他一些国家塑造为一个与西方对立的阵营。国际安全将被置于类似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对抗性基础之上。但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现在没有相互接受的结构平衡，没有公开和默认的规则，也还没有任何处理相关事宜的协议、条约、机制。也就是说，它的基础比冷战时期更不稳定。

俄乌冲突将对国际安全产生持久和深刻的负面影响。现在俄乌冲突尚未结束，停火与谈判进程刚刚开始，和平的曙光还只是隐约浮现在地平线上，但在炮火熄灭之前各种突变的可能依然存在，而且不能排除战争升级的风险。即使在冲突结束之后，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很快消失。俄乌冲突极大加深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对立，俄欧相互作为安全威胁的意识会更加强化，双方都将采取更具敌对性的安全政策和军事部署。

俄乌冲突打破了人们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意识、概念和规则。此前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变为可能，难以想象的景象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曾几何时，“战争是政治的工具”的经典论断似乎已经过时，不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方式已经成为通则，虽然一些传统的地区冲突时常爆发，特别是在中东和非洲，但没有人认为在文明的欧洲还会发生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俄乌冲突的爆发超过了人们最大胆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倒退了半个多世纪，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战争老路。现在战争越来越经常地被用于国际政治中，替代外交成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人们对战争的惧怕似乎已经淡化，谈论战争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包括核战争，支持进行战争的言论也变得堂而皇之。

可以认为，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看，俄乌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历史阶段性转折点，它的发生本身即打开了通向一个更不安全世界的大门。严格地说，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的负面趋势在俄乌冲突发生前已经形成，但俄乌冲突给这一趋势以巨大推动和加强，乃至使它在一定时期内难以逆转。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鲜明的标志，象征着曾激起希望的后冷战时期最终以悲剧结束，表明一个阵线更分明、对立性更明显也更动荡不安的时期的来临。

（二）军备竞赛重启

世界正在从军备控制的进程转向军备竞赛的进程，这是世界更不安全的又一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与人们的期望和预计相反，不仅没有出现军备的大幅削

减,反而出现军备攀升,并不断加速,形成新的军备竞赛。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正在加速展开^①。军备竞赛重启的基本背景是大国在地缘政治上走向对立,信任全无,对未来关系的预期悲观,以及地区安全形势持续动荡不安。这反过来又更强化了这种趋势,形成恶性循环。

军备竞赛首先反映在军费的非常规增长上。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世界军费开支已经连续九年增长,2023 年突破 2 万亿,达到 24 430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且,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定义的所有五个地理区域同时出现增长,这是 2009 年以来的首次^②。世界军费的连续非正常增长是国际安全形势最直接和最真实的反映。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军费开支国,即使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军费仍不断大幅提升,特别是近十年来,每五年左右就跃升一个台阶。在 2014~2018 年的五年间,美国年军费预算保持在 6 500 亿美元上下;进入下一个五年即 2019~2023 年,上升到每年 7 000 亿美元左右,每年绝对数额增加约 500 亿美元;2024 年又大幅增加 500 亿美元,达到 7 550 亿美元^③。但这还不是顶峰,特朗普执政后,他提出的 2026 年军费预算达到 1.01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同比增加 13%,为历史最高^④。

北约的情况与此相似,近十年来也大致是每五年跳升到一个新水平。2014~2018 年期间北约年军费基本维持在 9 千亿美元到 1 万亿美元之间,2019~2023 年期间每年超过 1 万亿美元,而 2024 年猛升到 1.47 万亿,增加了约 4 000 亿美元。2024 年在 32 个北约成员国中有 23 个达到了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水平,北约总体平均为 2.02%^⑤。

① 《古特雷斯:应对核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没有核武器》。

② “Global Military Spending Surges Amid War, Rising Tensions and Insecurity”.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4/global-military-spending-surges-amid-war-rising-tensions-and-insecurity>,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 日。

③ “Defence Expenditure of NATO Countries (2014 - 2024)”. https://www.nato.int/nato-static_files/2014/assets/pdf/2024/6/pdf/240617-def-exp-2024-en.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 日。

④ “Trump Budget Proposes \$1 Trillion for Defense, Slashes Education, Foreign Aid, Environment, Health and Public Assistance”. <https://edition.cnn.com/2025/05/02/politics/trump-budget-proposal-defense-spending>,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 日。

⑤ “Combined Defense Expenditure of NATO Countries 2014 - 202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93301/combined-defense-expenditures-nato/#statisticContainer>,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2 日。

在过去几年，欧洲的军费也大幅增加。2024 年欧洲军费达到 3 260 亿欧元，与 2021 年相比增加 31%，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1.9%^①。到 2027 年，计划再增加至少 1 000 亿欧元^②。随着美国对欧政策的剧烈转变，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欧洲的压力，要求其承担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欧洲继续搭美国的安全便车已难以为继，开始转向防务自主，其主要目标就是使欧洲成为一个能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对抗的军事集团。2025 年 3 月，欧盟发布了名为《欧洲防务白皮书——准备 2030》的文件，提出在未来五年投入 8 000 亿欧元对欧洲进行再武装^③。2025 年 6 月北约海牙峰会宣布，在未来十年里，北约欧洲盟国的军费开支将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④。2024 年北约国内生产总值为近 54 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约为 30 万亿美元，虽然北约的计划未必能够完全兑现，但军费数额将大幅度增加是确定的，而且其增加的空间是巨大的。

核风险明显上升。这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它对世界安全的意义是摧毁性的。可以认为，世界又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核竞争时期。美国认为国际核安全形势转向恶化从 2018 年就已开始^⑤，这特别表现在两个最大核国家即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它的表现形式主要不是数量的增加，而是双方实施广泛的核发展计划，对其核弹头、导弹、飞机和潜艇、运载系统及其核武器生产设施进行更替和现代化，研发新一代武器，提升性能，提高突防能力，增大威慑力，等等。美俄核力量的

① “White Paper for European Defence – Readiness 2030”.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e6d5db69-e0ab-4bec-9dc0-3867b4373019_en?filename=White%20paper%20for%20European%20defence%20%E2%80%93%20Readiness%202030.pdf,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25 日。

② Paul Hockenos, “Ukraine’s Narrow Path to Victory without Trump. How Kyiv and Europe Can Defeat Russia on Their Ow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6/09/ukraine-victory-intelligence-diplomacy-europe-defense-trump/>, 访问时间: 2025 年 6 月 15 日。

③ “ReArm Europe Plan: Ursula von der Leyen Unveils Major EU Defence Spending Initiative”. <https://defence-industry.eu/rearm-europe-plan-ursula-von-der-leyen-unveils-major-eu-defence-spending-initiative/>,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25 日。

④ “The Hague Summit Declaration: Issued by the NATO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The Hague 25 June 202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6705.htm, 访问时间 2025 年 7 月 8 日。

⑤ David Vergun, “Officials Outline Strategy in Nuclear Posture Review”.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309790/officials-outline-strategy-in-nuclear-posture-review/>, 访问时间: 2025 年 3 月 25 日。

发展又进一步对其他核国家产生影响。

冷战时期，具体说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苏为控制激烈的军备竞赛，降低发生战争的可能，陆续建立了双边安全机制，在战略安全领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条约，形成了战略武器控制机制。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最后一个重要条约是 2010 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3）。但这些经过几十年艰难努力才得以建立起来的安全措施，现在几乎已被废除殆尽，2001 年美国退出签订于 1972 年的《反导条约》，2019 年又退出 1987 年签署的《中导条约》，而 1996 年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没有得到主要核国家的接受，俄罗斯也于 2023 年撤回批准。START-3 是目前硕果仅存的最重要的核军控条约，但在俄罗斯 2023 年 2 月决定暂停履行后，也已经名存实亡。条约将于 2026 年 2 月到期，在俄乌冲突仍在进行的条件下，新的谈判难以举行^①，如果在条约期满之前不能达成新的协议，那将完全松开俄美的手脚，为无限制的核竞争敞开大门^②。

（三）核武器扩散与核试验再启

欧洲国家核武器的规模也有扩大的可能。由于担忧美国的核保护伞可能减弱，欧洲也在酝酿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核威慑体系^③，特别是在特朗普明确表示将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之后，这一问题更现实地摆在了欧洲面前。欧洲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将英法的核威慑覆盖到整个欧洲^④。这样，英法的核武库将部分地接替

① 俄外交部副部长 С. Рябков 表示，现在不具备进行新的消减战略进攻武器谈判的基础。В МИД РФ оценили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к ДСНВ. Рябков: оснований для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к ДСНВ сейчас нет.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news/2025/06/06/25973108.shtml?ysclid=mbn1gs5mj4325008751>,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0 日。

②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截至 2025 年 1 月，美国有核弹头 3 700 枚，俄罗斯 4 309 枚，英国 225 枚，法国 290 枚，中国 600 枚，印度 180 枚，巴基斯坦 170 枚，朝鲜 50 枚，以色列 90 枚，共计 12 121 枚。Nuclear Risks Grow as New Arms Race Looms—new SIPRI Yearbook Out Now.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5/nuclear-risks-grow-new-arms-race-looms-new-sipri-yearbook-out-now?>,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③ Rym Momtaz, “Taking the Pulse: Can Europeans Build Their Independent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t?”.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strategic-europe/2025/04/taking-the-pulse-can-europeans-build-their->,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4 日。

④ Lesia Dubenko, “Macron Floats Extension of French Nuclear Deterrence to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https://euromaidanpress.com/2025/03/06/macron-floats-extension-of-fra-nuclear-deterrence-to-other-european-countries/>,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4 日。

原来由美国承担的责任，功能的扩大必将推动英法加强核力量。英国已经宣布，为应对面临的危险，将投入 202.5 亿美元新建 12 艘攻击核潜艇^①。

俄美在欧洲地区重新部署中远程导弹^②，举行更加接近实战的使用核武器的战略和战术演习，对各自核战略进行修改更新，基本导向是强化核力量，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美国前总统拜登在竞选期间曾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思想，但在其当选后发布的 2022 年《核态势评估》中仍拒绝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认为这一政策会给美国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并首次把俄中同时作为核对手^③。美国计划在 2021~2030 年的十年预算里为核武器现代化投入 6340 亿美元，比上个十年的预算增长 28%^④。俄罗斯在 2024 年 11 月新出台了《核遏制领域国家政策基础》，与 2020 年 6 月的版本相比，它最显著的特点是显著扩大了使用核武器的适用范围。

美俄事实上也都将核武器扩散到了各自的盟国。北约也是核联盟，它坚持核威慑是北约的支柱政策，北约扩大也意味着核联盟向新成员国的扩展，并且不排除在新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准备为欧洲盟友提供核保护，将本国的核威慑力量部署到欧洲盟国^⑥。波兰则主动要求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⑦。乌克兰也提出，如果不能加入北约，它要求北约向它提

① “UK to Build 12 Nuclear Submarines and Invest 15 Billion in Warhead Programme, Starmer Announces”. <https://defence-industry.eu/uk-to-build-12-nuclear-submarines-and-invest-15-billion-in-warhead-programme-starmer-announces/>,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5 日。

② 2024 年 7 月美国宣布将在德国部署地面中短程导弹，同年 12 月俄罗斯宣布取消暂停部署地面中短程导弹的决定。Лавров: наш мораторий на размещение РСМД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жизнеспособен. <https://www.kommersant.ru/doc/7420039?ysclid=m7064z5n4f715799885>,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 日。

③ “202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https://armscontrolcenter.org/2022-nuclear-posture-review/>

④ Rebecca Kheel, “CBO: US Nuclear Arsenal to Cost \$634B over 10 Years”.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555142-cbo-us-nuclear-arsenal-to-cost-634b-over-10-years/>

⑤ “NATO Refuses to Guarantee Non-De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in Sweden and Finland”. https://www.oreanda-news.com/en/v_mire/nato-refuses-to-guarantee-non-deployment-of-nuclear-weapons-in-sweden-and-finland/article1431971/,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5 日。

⑥ “Europe Unveils Peace Plan for Ukraine Amid Tensions with Washington”. <https://eutoday.net/europe-unveils-peace-plan-for-ukraine/>,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5 日。

⑦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льши попросил США разместить ядерные ракеты в его стране. <https://www.moscowtimes.ru/2025/03/13/prezident-polshi-poprosil-ssha-razmestit-yadernie-raketi-v-ego-strane-a157883>,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供核武器^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伙伴也在扩大。2021 年 9 月，美国宣布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事联盟，主要内容之一是美英与澳大利亚分享核潜艇技术，向澳提供核潜艇，并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生产能力^②。俄罗斯在 2023 年 3 月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将核武器部署到他国。诚然，美俄的核扩散是针对不同的方向，但扩散本身就突破了一个重要界限。

俄美沉寂多年的核试验也可能被打破。两国最后一次核试验分别是在 1990 年和 1992 年。2023 年 11 月，普京宣布撤销 1996 年俄罗斯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③，以作为对美国可能恢复核试验的预备性应对措施。美国国内早已有恢复核试验的呼声，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会停止这一趋势。在特朗普重新就任前夕，与特朗普接近的传统基金会发表报告，主张美国必须恢复核试验^④。2025 年 1 月特朗普上任伊始，就签署了建设“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行政命令，又在四个月后正式宣布将其改名为“金穹”^⑤。这一项目计划耗资 1 750 亿美元，把从地面拦截器和战斗机防御到舰载和天基系统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下的防御体系，旨在构建不受任何约束的全球性、多层次、多领域导弹防御系统。它完全否定了战略进攻性武器与战略防御性武器之间不可分割的原则，威胁国际战略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对此持反对态度^⑥，俄罗斯认为这是特朗普版本的

① Daniel Roland, Зеленский попросил у НАТО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https://www.moscowtimes.ru/2025/02/04/zelenskii-poprosil-unato-yadernoe-oruzhie-a154211>,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② “AUKUS: The 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 between Australia, U.K. and U.S.”. <https://www.defense.gov/Spotlights/AUKUS/>, 访问时间：2025 年 5 月 30 日。

③ Путин отозвал ратификацию Договора 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 запрещении ядерных испытаний. <https://www.moscowtimes.io/2023/11/02/putin-otozval-ratifikatsiyu-dogovora-o-vseobemlyuschem-zapreschenii-yadernih-ispitanii-a112063>,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4 日。

④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US Should Prepare for Nuclear Weapons Tests”. <https://news-pravda.com/world/2025/01/16/982850.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21 日。

⑤ “Donald Trump Announces Golden Dome Defence Project – Confirming US Plans to Put Weapons in Space”. <https://news.sky.com/story/donald-trump-announces-golden-dome-defence-project-confirming-us-plans-to-put-weapons-in-space-13371694>, 访问时间：2025 年 5 月 30 日。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05/t20250509_11617805.s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5 月 30 日。

“星球大战”计划，是将战略武器推向太空的步骤，不能不使核竞争升级^①。

还要看到的是，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认识和概念也在向着危险的方向变化，简单说，就是对使用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变得轻率。“核战争打不赢，不能打”的公式受到严重挑战，对核威慑的恐惧感降低，不负责任的侥幸心理增强，把核武器常规武器化，认为使用小型战术核武器不会造成通常认为的核灾难，也不一定导致核大战，甚至认为核战争可以打，也能打得赢的观念得到更多接受。这种对核战争认识变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著名核问题学者浦洛基写道，观念的变化正是现今核危险的重要根源。他认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那一代人敏锐地意识到，原子弹可能摧毁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因此他们如履薄冰，在制定政策时对核战争后果的恐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现在一些国家领导人却对核武器和核战争漫不经心，不以为意^②。立陶宛前总统就公开宣称原子弹已经过时，并建议民众不用再害怕发射原子弹的危险^③。

俄乌冲突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启示和效应：它会使准核国家更不会放弃核武器，并刺激另一些国家希望拥有核武器，从而增加核扩散的风险，使世界更加危险。核武器是终极武器，它有一种特殊作用，即能使小国迅速弥补与大国在实力上的劣势。小国有了核武器，大国在人口、国土面积、经济规模上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会被抵消^④，小国只要抱着玉石俱焚的姿态，也能对大国形成威慑，使它不敢对其轻举妄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有最切身的体会，他在战争爆发后

① МИД анонсировал начало “ядерной гонки” с США из-за планов Трампа возродить “звездные войны”. <https://www.moscowtimes.ru/2025/02/01/mid-anonsiroval-nachalo-yadernoi-gonki-sssha-iz-za-planov-trampa-vozrodit-zvezdnie-voini-a153925>, 访问时间: 2025 年 5 月 30 日。

② [美] 沙希利·浦洛基:《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孙宁、王梓诚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

③ “Это уже устаревшее средство”. Экс-президент Литвы посоветовала согражданам не боятьс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https://www.moscowtimes.ru/2025/05/13/eto-uzhe-ustarevshee-sredstvo-eks-prezident-litvi-posovetovala-sograzhdanam-ne-boyatsya-yadernogo-oruzhiya-a163216>, 访问时间: 2025 年 6 月 3 日。

④ [德]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程卫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74 页。

说，如果乌克兰有核武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就不会爆发^①。俄乌冲突还给大国安全保障的信誉带来沉重打击。1994 年，美俄英乌在布达佩斯签订了《安全保障备忘录》，乌克兰放弃核武器和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俄英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结果如人们所知。然而，这份《安全保障备忘录》并非一无是处，它避免了一个仅次于美俄的新超级核大国的出现，它的可悲之处在于大国所许诺的安全保障没有兑现。可以想象，这不能不使小国对大国的承诺产生不信任感，相信只有把核武器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可靠。此外，一些非核国家也有发展核武器的项目，这对如何保证不违反核不扩散条约提出了新问题。

（四）排他性军事集团的扩张

排他性军事集团的存在和扩张是大战发生的重要因素，现在这一因素不仅未减少，而且还在发展。北约把继续扩大作为既定方针，而乌克兰是最主要对象，在 2024 年 7 月的北约华盛顿峰会上，北约明确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逆转的方向^②。尽管乌克兰的加入将面临多重障碍，但即使不能正式加入，北约与乌克兰在安全上也已形成共同体，近乎事实上的安全联盟。可以预测，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北约和乌克兰仍将进行深度安全一体化。

北约也在沿着大陆和海洋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展，通过诸如和平伙伴关系、“北约+”、定制伙伴关系项目（ITPP）等不同形式，建立起北约向亚太地区输出军事存在和影响的渠道，并形成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机制的对接。北约与一些亚太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包括设立联络机制、进行联合军演、开展网络合作、合作制造战机，等等。它的军舰和战机已出现在中国南海乃至台湾海峡。通过欧亚大陆，北约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高加索、中亚、蒙古；通过海洋，它到达了澳新、日韩、南亚、东南亚。北约在亚太的目标尚不是增加新成员，而是功能性的扩大。它与各国关系的程度深浅不一，最密切和最具实质性的是与日韩和澳

^① Зеленский: Если б у Украины было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втор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не было бы. <https://www.pravda.com.ua/rus/news/2021/02/1/7281898/>,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20 日。

^② “Washington Summit Declaration Issu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Washington D. C”.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27678.htm,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20 日。

新的关系。它有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针对中俄朝，北约对此并不掩饰^①。北约向亚太地区的渗透和扩张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

2025 年 1 月特朗普的重新当政给国际政治带来剧烈冲击，美欧和美俄关系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出现裂痕，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开始缓慢恢复，一些原有概念的有效性已经动摇，包括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支柱之一的大西洋联盟关系，北约首当其冲。不过，可以判断，美欧的排他性军事集团还会继续存在，并且仍会发展，只是形式会有所改变。即使美国从欧洲安全事务中部分退出，欧洲也会以自身力量维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集团。

在对欧洲安全的关注下降的同时，美国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力度加快并增强。对大西洋联盟的淡化只是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联盟政策。与大西洋联盟不同，美国在亚太地区无法构建一个整体的联盟，它主要是通过双边联盟和小多边联盟形式构成一个复合的联盟网络，它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而不是俄罗斯，美国对此已完全不加掩饰。在 2025 年 5 月的香格里拉防务论坛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对中国发起挑战，要求亚洲国家站到美国一边，与美国一起共同应对中国“威胁”^②。

（五）地区冲突频发

地区冲突是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大因素。从世界范围看，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仍是地区武装冲突频发的时期，包括在欧亚、中东、东亚、南亚以及非洲的萨赫勒地区。俄乌冲突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使中东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未来，即使在这些冲突结束之后，和平仍将是脆弱的，留下可能爆发冲突的病灶。地区冲突热点不会减少，更难以消失。

影响国际安全和刺激战争发生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科技发展和赢利方式的改变并没有使传统战争目标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又增加了新的诱发战争发生的风险。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仍是现实的危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战

① “NATO Takes Stock of Cooperation with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32471.htm, 访问时间：2025 年 5 月 30 日。

② Matthew Olay, “Hegseth Outlines U. S. Vision for Indo – Pacific, Addresses China Threat”.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 – Stories/Article/Article/4202504/hegseth – outlines – us – vision – for – indo – pacific – addresses – china – threat/>, 访问时间：2025 年 6 月 15 日。

争形态发生了革命性改变，如网络、信息、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等，它们提供了新的战争工具，创造了新的战争形式。战争的范围也在超出传统的战场，向着更大的空间发展，包括虚拟空间、太空、极地、海底等等。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未来的国际安全增加了一个未知的重要因素。它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现在还无法充分估计它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无法确定它对国际安全影响的深度和性质。人工智能是一项技术，它可产生正面作用，也可产生负面作用，这取决如何应用，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可以断定，由于其使用灵活、成本低、代价小、效率高，可以避免军队的直接接触和己方人员的大量伤亡，因而使得发动战争更容易，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还处于没有规则的“丛林”时期，还有脱离人类控制的可能。

此外，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国际秩序的瓦解，国际制度和机制的调解力和约束力大大减弱，原有的规则被屡屡突破，这也使得战争越来越轻率和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解决争端的工具。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正在到来的是一个更不安全和更不稳定的世界。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都是从负面角度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观察，不意味着没有正面因素，也不意味着世界是一片灰暗。世界上还存在着强大的和平力量，反对战争已经成为不可挑战的共同价值观，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 寻求国际安全的路径

那么，应该如何使世界从这种危险状态走出来、使世界更安全呢？没有灵丹妙药，也不会出现奇迹，这只会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俄乌冲突仍在进行且结局不定的情况下，在世界安全秩序还处于毁坏的过程中，在美欧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达到稳定状态前，国际安全前景还处在难以看清的迷雾中。

形成全覆盖的共同安全体系是最理想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国际安全体系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安全安排，而应是一个包括理念和原则、框架和机制、规则和规范的综合系统，并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提出理想和完美的设计并不难，但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却困难重重，对此国际社会深感无力。虽然许多国家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构建一个相对统一、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国际安全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可望不可即。各大国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安全体系有着各自的设想，它们所持的理念和立场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对立。形势不是向着寻求共同安

全的方向发展，而是在以更大的惯性回到传统的老路，安全机制趋向碎片化和对立化，而不是形成协调的共同安全体系。尽管如此，建设一个相对较有普遍性的国际安全体系仍是长期目标，国际社会应为此不懈努力，不是为了对某种形式的追求，而是因为这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世界提供安全，人类总应有这样一个理想，这也是人类理性进步应有的方向。

有观点认为国际安全体系既不可靠也没有用处，因而也不需要，国家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安全。这等于重返“丛林世界”，是文明的倒退，不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在实践上，这最终将导致世界的混乱无序，各国将生活在更不安全的国际环境中。

不能期望建立永久和平的机制，也不应幻想建立万能的安全机制，一种安全机制往往在形成后的一段时期较为有效，而在几十年后就会发生新的战争，这说明安全机制的效能不是恒定的，其原因是相关国家或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导致稳定状态被打破。因此，一种安全机制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也有时效性，需要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发展和调整。

从过去的安全机制特征看，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它都是以外在的方式制约战争的发生，很难解决战争发生的根源，而战争的根源不是单一的，它远超安全机制所能控制的范畴。而且，有的安全机制虽为防止战争发生而设立，但它本身反而成为刺激战争发生的因素，形成安全悖论，如排他性的军事结盟使他国感到不安全，因而刺激他国扩充军备，寻求结成联盟以抗衡，导致军备竞争乃至冲突。

国际安全体系建设既需要创新，也需要从历史中学习，从历史走向未来，接受有益经验，吸取各种教训，避免曾经出现的错误。事实上，有关国际安全的各种基本要素大多在过去都出现过，它们仍有现实意义。虽然时代、环境、技术、人文条件已经不同，但人性总有难以改变的东西，物理的作用也不会消失，现在国家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需要在已有的经验教训上提高一步，符合时代的进步，适应新的世界安全形势，既要创造新的维护和平的理念和机制，也要利用旧有的但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已有的历史经验中，除了二战之后创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外，最有教益的启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维也纳体系所创立的大国协调。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现在不仅仍是减少国际冲突的重要保证，而且比以往更加需要。大国协调显著地降低了 19 世纪欧洲发生战争

的次数，因而现在重新受到关注，被视为可借鉴的国际关系范例，以致有观点提出应建立新的全球大国协调机制，认为这是维护世界安全的最好方式^①。

而在已往的历史教训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封闭性、排他性、针对性的军事联盟所带来的危害。这一因素促使一战和二战的发生，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重要背景^②。因此，降低排他性和针对性军事联盟的作用是国际和平建设的重要一环。遗憾的是，尽管历史已经提供了如此之多的惨痛经历，但很难说西方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或者说，它从中得出的是恰恰相反的结论，即战争的发生不是因为军事集团的扩大，而是因为扩大得不够。

安全体系是宏观的，但安全是具体的，如不能解决具体的安全问题，安全体系也就失去了意义。在现今这个武装冲突频仍、国际秩序混乱不堪的特定时期，构建国际安全体系的现实路径是从具体问题入手。毫无疑问，首先是要熄灭正在燃烧的战火，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冲突，并防止新的武装冲突发生。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在各方仍在厮杀的状态中，安全体系的建设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只有结束战争，安全体系的建设才能真正付诸实践，而且，这本身也是国际安全体系建设的意义所在。

大国在国际安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本身即是国际安全的核心内容，国际安全的主要问题也都是围绕大国关系展开，例如核军控、反导、外层空间安全、网络和人工智能安全，等等。在地区安全层面，大国的影响同样重大。在正面意义上，大国对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地区稳定的作用不可替代；在负面意义上，它也是地区冲突难以解决的重要症结，甚至它本身就是导致地区冲突发生的原因。大国关系的走向决定着未来国际安全体系的前景，国际安全体系的形成和它的构成形式都取决于大国关系的形态。大国关系有不同形态，它们可能是伙伴合作型，也可能是普通正常型，还可能是对立对抗型；国际安全体系的构成也有不同

① Richard N. Haass and Charles A. Kupchan, “The New Concert of Powers. How to Prevent Catastrophe and Promote Stabil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3-23/new-concert-powers>,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30 日。

② 有看法认为，导致俄乌冲突的原因不仅是北约扩大，更主要的是它将俄罗斯排除在外。“American Securocrats Pushed for Expansionist Policies in the 1990s That Set the West and Russia on a Path of Confrontation”，引自 Leonid Ragozin, “Biden’s Ukraine Disaster Was Decades in the Making”.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5/1/18/bidens-ukraine-disaster-was-decades-in-the-making>,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30 日。

的模式，它可以是集体共同构建，也可以是由对立的双方通过谈判妥协达成，还可以由不同的区域安全体系自然连接形成。安全体系的模式取决于大国关系的特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大国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安全体系。

在大国关系处于不同状态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形成国际安全体系，而不是只有在它们关系良好时才有可能。不能期望所有大国关系都会根本改善，历史上也鲜有所有大国之间都和睦相处的情况，而更多的是竞争和冲突，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正是国际安全体系被需要的原因。以欧洲为例，虽然在 19 世纪、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十分不同，但欧洲都形成了安全体系，只是它们的结构特征不同。当然，处于战争状态是另一种情景，那已经没有安全体系可言，如现在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对它们来说，现在的目标是压倒或打败对方，而不是共同建立安全体系。虽然现在建立国际安全体系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大国可在对国际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具体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包括军控、核不扩散、反导、网络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外层空间安全、极地安全，等等。这些具体领域都是国际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推进都有助于国际安全体系的形成。

在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地区安全中，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没有它们的参与，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不可缺少。现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现象是中等强国的概念在兴起，它反映了地区大国欲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同时，在国际秩序陷于混乱松散的背景下，地区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上升。

在现今的国际政治结构下，由上至下地创建国际安全体系基本没有可能，现在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单独构建一套为世界所接受的安全体系，同时它们也没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创建新的国际安全体系，如同一战和二战之后的情况。在现今的条件下，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性安全体系是主要趋势，也就是从区域的角度出发，以保障地区安全为目标规划安全框架，建立安全机制。这有合理性。地区和地区的安全问题不同，相对来说，每个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安全体，有本地区特别的安全问题，这促使它们首先关注建立保障本地区安全的机制。地区安全问题的改善，同时也是国际安全环境改善的组成部分。不过，如果一个地区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安全机制，它们之间不能形成相容的关系，而是相互对立和对抗，则它们就变成不安全的来源。此外，排他性和扩张性的地区安全机制也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现在提出建立新的全欧洲安全体系不切实际，但在俄乌冲突结束后，俄罗斯

与欧洲的关系将慢慢恢复^①，建立欧洲新安全体系的需求会重新出现。虽然建立统一的欧洲安全体系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但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避免发生战争的愿望。在这个最大公约数下，俄欧有可能找到使两种安全思想对接和共存的妥协形式。这并不需要它们的关系恢复到战前的程度。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军事集团对立，但这也是国际安全体系发展较好的时期。俄罗斯已经提出了建立欧亚安全体系的设想，按照俄罗斯的想法，欧亚安全体系也向欧洲国家开放，但看不到英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有加入的可能，因此难以成为全欧洲的安全框架。欧洲安全体系的构成更可能是回到冷战时期的模式，即以对立双方的战略平衡为基础达成妥协。

不论对未来国际安全建设的设想是什么，它们的起点都应首先是首先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现在世界上存在多个安全热点地区，而就对整体性国际安全的现实挑战来说，最为突出的是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两场战争就其规模和影响来说都不仅关系到地区安全，而且也关系到世界稳定。它们都在国际政治上造成了国家间的分裂对立，乃至对正常的国家关系形成破坏。两场战争都有升级为地区性大战的可能，特别是俄乌冲突。如果北约更深和更直接进入乌克兰，俄乌冲突必将升级，有可能演变为欧洲大战，这样，整个国际安全形势又将是另一幅图景，核战争的风险也不能排除。而就其潜在的危险性来说，亚太地区的风险最大。亚太地区现在虽然基本稳定，但暗流汹涌，随着美国加快将安全重心向亚太转移，加强在亚太地区推进军事部署，美国针对中国的意图越来越公开、大胆、直接，安全风险在不断聚集和升温，而它一旦爆发，将成为下一波风暴的中心。因此，从国际安全角度看，如何结束俄乌冲突，如何防止亚太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如何不使两个地区在安全问题上发生负面联动效应，即一个地区安全形势的缓和反而推动另一个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这是需要尽最大努力解决的问题。

结 语

和平与安全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为了避免战争和保持和平，思想家们

^① Annmarie Hordern and Andrea Palasciano, "NATO Chief Says Russia Relations Should Be Restored Post War".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3-14/nato-chief-says-russia-relations-should-be-restored-after-war>,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30 日。

提出过种种理念，国际社会尝试过多种安全机制，也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安全模式，但始终无法彻底消除战争，“永久和平”仍然只是一个理想。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产生了乐观主义的情绪，但从 20 世纪末开始，世界进入了一轮新的战争周期，先后发生了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俄格战争，一直到 2022 年和 2023 年爆发并延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未来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冷战思维在西方的战略思维中仍占主导地位，地缘政治竞争在加剧，世界卷入新的军备竞赛，并伴随着核扩散的可能和高科技发展混合战争形式的出现，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高风险的热点地区，这些都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

在可预见的将来，形成具有相对整体性的国际安全体系困难重重，但国际社会不能放任自流，不能退回到“丛林时代”，而应努力寻找防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的途径。为此，需要推广新的安全理念，同时也需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有益和有效的做法。大国关系是形成国际安全体系的关键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国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国际安全体系。在大国尚不具备达成战略妥协的条件下，可以就具体的安全问题进行谈判。地区冲突是国际安全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的作用极为重要，不可替代。安全概念是宏观的，但安全是具体的，在当前形势下，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是通向安全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开始进行安全体系建设的前提。在所有的安全机制中，最可靠的保障是构建良好的国家关系，但遗憾的是，这一最简单但最具智慧的安全路径却经常被遗忘或忽视。

（责任编辑 胡冰）